

评书的声音实践及媒介记忆建构

赵 寰 侯清鹏 蒋 波

摘要:评书是我国古代优秀民间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代表,其发展过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背景、历史特征和媒介影响。评书传播历经跨越时空的声音实践,广播的兴起促成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评书的繁荣发展,电视、数字媒介等迅速迭代带来评书样态的持续转型新变,数字智能化时代开启赛博空间听众新的评书媒介实践。作为数字化生存的“游牧式”运动主体,阅听人秉持其流动性特征,通过对各类听觉文本内容的自主性筛选和阐释,在现实空间、虚拟空间和记忆空间的多重叠加影响下穿梭行走,构筑专属的信息流、内容流,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并编织“意义之网”。而凭借演绎相同文本内容,评书实践创造的不同时空个体间的共时性经历,使得他们在相同听觉系统中相遇,在其中展开想象、沟通、连接,并利用声音与听觉形成独特的经历与体验,进而形成“听觉共同体”。人们在流动的记忆之场中,或找寻评书记忆中的“微光”,或对经典故事情景进行想象拼接、代入分享,实现实体—想象—记忆三个空间的勾连和混合,文化记忆由此以符号展演的方式建构起稳固的回忆空间,让文化的永恒内核得以留存并不断延续。

关键词:评书;听觉共同体;文化记忆;媒介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4-0093-10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L23AXW003);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JYTMS20230669)

评书是我国古代优秀民间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代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文化认同。评书的发展,得益于曲艺人的扎根群众、薪火相传,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特征。与此同时,作为听觉的艺术,评书的发展与媒介历史的演进息息相关。媒介的发展为评书实践提供既定的社会舞台,并不断创造出新的条件。起初,评书最基本的活动形式依赖具体的现实空间,强调人们在特定的场所参与听书活动,凭借现场的说演氛围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勾连。伴随媒介的快速迭代发展,评书的有声在场实践逐渐被“可缺席”的听觉实践所代替,例如,在中国流行广播媒介的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每天中午或傍晚时分准时围坐在广播旁边收听评书,曾成为一种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1]而今,数字化媒介平台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为评书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并由此带来评书声音实践的新转向。

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历程中,评书借由不同媒介,以不同样态的声音实践为人们形塑了别样的思维、感知、经验、记忆和交往模式,人们在不同媒介所建构的评书互动关系网络中,不断编织着意义之网,并打造了不同的记忆之场。基于此,本研究引入媒介学研究视角,试图探讨评书在媒介化时代的关系建构与记忆生成问题,引入评书实践场域中的技术、平台、文本等非人类行动者,将其与人类行动者(听众/用户)置于同等地位,基于一种动态性的理论研究视角来探究媒介技术的发展与评书声音实践的关系,进而重新审视评书实践过程中人与文本、声音、平台、记忆生成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评书跨越时空的声音实践与当代转向

(一) 中兴繁荣:广播兴起推动评书驶入快车道

现代评书文化兴起前,古代称之为“说书”,根据相关记载,最早可以上溯春秋时期。早期的评书实践主要集中在民间,通常由知晓奇闻轶事的人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进行小范围传播,而后评书艺术不断发展壮大,渐渐变成由评书艺人在茶馆、书场等公共场所进行表演。无论何种形式,评书实践的底层逻辑皆是传受双方在特定现实空间中完成的面对面具身性互动,其被视为声音实践的主要叙事活动,依靠面对面传播互动所产生的“物理亲近性”与“情感直观性”成为当时评书实践主要的艺术文化表现特征。

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拾音、电子传输及录音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声音得以从原始声源中独立出来,声音信息逐渐实现异地复制拷贝与潜入重组。伴随无线广播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尤其是收音机、录音机和广播的出现,进一步重塑以天桥、茶馆、书场等固定场所为表演基础的评书实践,使得源于现场表演的评书经由传播媒介的播放而脱离实践的在场性,不同空间的人、事、物得以通过诉诸媒介和听觉感官进行瞬时连接。20 世纪 70 年代末,小型且低价的收音机开始走进千家万户,而评书实践凭借擅长说演声音造型的表演手段,很好地契合了无线广播的传播属性。于是,评书实践逐渐从书馆走向广播电台,进而造就出一批杰出代表的“广播评书人”。譬如,评书名家单田芳,自 1979 年开始与鞍山电台深度合作,其苍劲有力、极富个性的声音,通过电台传遍大江南北。同样作为评书界的旗帜,刘兰芳以其极富磁性且激昂的声音,能够在瞬间将听众带入战火纷飞、英雄辈出的时代。该时期,评书的声音实践通过电台广播逼真而无远弗届的传播属性得以极大的释放,收音机的便携性解放了听众收听地点的限制,加之评书讲演结构独到的悬念、传情效果,以及来自评书艺人的口头文学表达形式为古典名著灌注的民间情感,迅速填补广大民众贫瘠的文化与娱乐生活,缔造评书在广播时代强大的传播力与生命力。

(二) 积极探索:媒介迭代促动评书样态转型生新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不断涌现,媒介环境生态与传播样态的转变迫使评书实践进行根本性变革。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电视媒介兴起,因其多形态传播的特性,大大提升了评书艺术的观赏性。1985 年,田连元在辽宁电视台录播了传统长篇评书《杨家将》并受到了广泛欢迎,他也由此成为电视观众最喜欢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之一。^[2]与此同时,传统的、凭借广播而繁荣发展的评书实践日渐式微。然而相较于“广播评书”的持续发展,“电视评书”实践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趋向冷寂。这是因为电视节目的愈加丰富,使得观众对奇观化影像制作的方式更加青睐,评书相对固定沉稳的形式已经不符合观众的需求,再者,电视接受空间扁平化的结构,使得观众对新内容的需求量巨大,但评书由于篇幅长,改编难度大,难以适应快节奏损耗性的内容消费模式,于是作为传统艺术的评书实践在电视媒介时代逐渐衰落。^[3]

21 世纪以来,数字化浪潮奔腾而至。网络技术作为新媒介,去中心化与开放性是其最显著的结构特征,进而造就了“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分布式网络空间,碎片化、奇观化的短视频成为各大平台内容信息形式的主流。然而当短视频日益繁杂,令人眼球过载、信息内爆,为拯救“视觉霸权”下人的感官偏向,听觉文化实现回归,给人以松弛感和情感陪伴的“耳朵经济”重获青睐。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声音经济产业市场规模达 5688.2 亿元,用户规模已达到 7.47 亿人,预计 2029 年规模将突破 7400 亿元,用户达 8.22 亿人。^[4]此外,喜马拉雅发布的《2024 春季有声阅读数据报告》显示,喜马拉雅过半用户每天听书时长超过 30 分钟,六成以上用户的年听书

量在 11~30 本,有声阅读的受众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Z 世代(1995—2009 出生的一代)作为有声阅读新星闪亮登场,喜马拉雅 30 岁以下用户占比 35%。聚焦内容而言,相声评书、网络文学、儿童故事等成为春季收听 TOP10 内容类型。^[5]见图 1。可见,评书文化已然得以穿透时光,实现向互联网空间的延伸。听书网站、播客平台、音频直播等,作为媒介融合时代广播评书的数字化形态,抓住了感官流转的商业机遇,填补了受众“碎片化”的时间空隙,并以其丰富的功能改变和塑造着新的媒介听觉空间和评书实践样态。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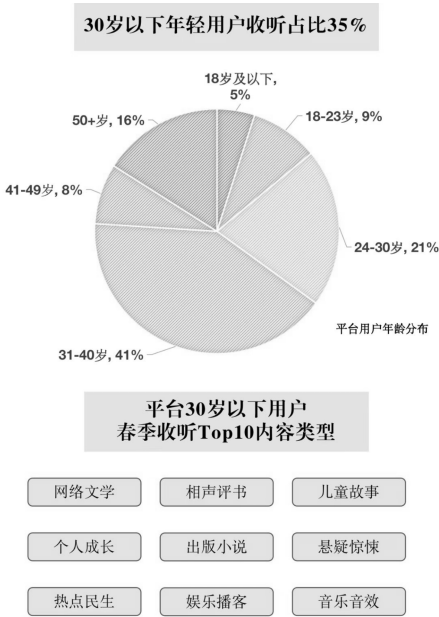


图 1 喜马拉雅平台年轻用户收听占比^[5]

表 1 单田芳评书账号播放数据		
排序	评书名	播放量
1	乱世枭雄	38.4 亿
2	白眉大侠	36.9 亿
3	童林传	14.5 亿
4	三侠剑	14 亿
5	龙虎风云会	9.3 亿
6	新隋唐演义	9.3 亿
7	小五义	5.5 亿
8	大明演义	5.4 亿
9	薛家将	5 亿
10	三侠五义	4.5 亿
11	三国演义	3.8 亿
12	西游记	3.8 亿

注:依据喜马拉雅 App 数据进行整理

（三）继往开来：多元媒介开启评书实践新转向

当前,媒介的发展走过口语、文字、广播、电视、互联网的历史,并在发展中逐渐趋向深度移动化、智能化的进路,其表现为去中心、开放、平权、节点多元的媒介特质,为文化传播开启新的发展路径。于评书实践而言,数字时代为其提供更为宽广的道路,从传播载体到表现形态,从创作方式到接受模式,都在持续推动评书实践向深度媒介化方向发展。媒介化转向不仅拓展评书的艺术边界,更重塑其与当代受众的联结方式。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人们原有的信息接收与生活方式,实现社会交往互动与信息接收传播的网络化、虚拟化和智能化。评书艺术的发展与媒介技术相伴相依,评书细腻的表演手法和丰富的内容资源,决定其在内容为王的智媒时代,将和数字化生存的个体、社交化的分发模式、移动化的在场叙事、智能化的内容生成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智能媒介不断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扮演的角色也从“信使模式”向“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6]的方向变化。连接性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核心逻辑,使媒介超越信息存储的物理属性,实现人与内容、内容与内容之间的智能连接与精准适配。这一过程不仅丰富我们的文化感知体验,更重塑媒介使用习惯,重构注意力分配机制,最终深刻影响我们的认知模式、社会关系建构和集体记忆形成。智能媒介的深度发展也在重构时空体验:通过消弭现实与虚拟空间的界限,它将传统的计时体系转化为以内容为中心的媒介时间。在这种新型时间维度中,人们不再单纯依赖钟表刻度,而是通过媒介内容的流动来感知和丈量时间的流逝。在智能媒介生态下,评书艺术获得

多维度的内容展示空间。通过跨平台传播策略,评书内容得以与各类数字媒介深度耦合:一方面,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收听场景;另一方面,平台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内容的精准排序、分类与推送。以喜马拉雅、蜻蜓FM为代表的音频平台,不仅重构评书的传播范式,更为这一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型提供新的发展契机。我们需要重新发掘数字听觉—内容—媒介之间的关系,构筑赛博空间下听众新的媒介实践。

二、新口语文化:“游牧式”运动主体生成意义之网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创造性地提出“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两极性概念,并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生口语时代、文字印刷时代和次生口语时代。^[7]在沃尔特·翁看来,原生口语时代是未加文字修饰、不知文字为何物的口语文化时代,此时人们的交往互动更多是借助口语,同时更为注重面对面的感受以及情境的共鸣。而文字印刷时代,文字能够固着认识对象以及思想产物,人类的知识生产逐渐从以往的“粗放”向“精细加工”的符号操作转型。但因文字印刷时代的去情境化特征,即不注重群体的学习、对话与交流,使得文字印刷时代脱离现实生活,逐渐沦为过分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叙事活动。于是,次生口语时代被寄予厚望,也正如沃尔特·翁所预料的,数字媒介的发展正在使口语文化以新的形态得以复活,数字技术将我们带入全新的“次生口语文化”时代。不同于原生口语时期,次生口语时代着重强调大众的互动交流转变为以电子网络为主要媒介的公共对话,原先依赖现实空间建构起来的互动关系也转为由虚拟网络所搭建起的连接。次生口语文化诞生于电子媒介时代,其创造出“以电影、广播、电视、电话和互联网等为主的虚拟的仿真公共会话载体”^[7]。因此,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评书的声音实践在次生口语时代迎来新的转向,即与数字化节点的游牧式生存相关、基于移动场景的内容开发和社群的交流互动,成为人们回忆评书内容、交流历史典故和多场景体验的根本。

“游牧”概念最早见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脱胎于大众艺术消费的人类新种族”的诞生,“显著特点就是流动性……等同于从前的游牧生活”^[8],即各类听觉文本内容,通过听众的自主性筛选和阐释,引申出对文本的挪用和意义发现。具有赛博格化属性的后人类,在现实空间、虚拟空间和记忆空间的多重叠加影响下穿梭行走,构筑专属的信息流、内容流,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并编织个体化的意义网络。而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曾说:“人是一种动物,悬浮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9]这些网络构建出的系统,不仅定义我们如何感知生活片段,更戏剧性地重塑个体的决策机制。因此,评书实践的意义之网是用户巧借各类评书文本寻找自我、建立联系,并获得文化阐释的权利,进而形成记忆链条的基础。

(一)听觉复兴:评书实践再造感官平衡

视觉中心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知觉体验,也是一种文化借喻”^[10],长期以来,视觉中心主义极致遵从理性,进而挤压了感性等人文主义要素的生存空间。“我们时至今日主要被视觉所主导的文化,正在转化成为听觉文化: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大势所趋的。”^[11]麦克卢汉将人的感知赋予特别的意义。在他的视角里,人的感官是个体能量上“固持的电荷”^[12],是形成社会知觉和经验的基础,多维感知统合的“整体人”更有助于拥有完整的社会感知和思维逻辑,而文字与视频内容所依赖的线性叙事结构,强化了视觉中心主义,使听觉及其他感官体验边缘化,进而导致认知方式的碎片化与文明发展的失衡。

当前,听觉文化随着智能媒介的崛起、赛博化空间的打造得以复兴,并激活耳朵经济的繁荣,评书文化作为口语和听觉的结合,呈现数字时代的新型“感官统合”。从语言上分析,评书人通过语言

的评说来交代故事的背景缘由和细节,运用大量对话的方式叙述人物生平经历,其中夹杂旁白以及典型人物的独白、思维活动等,该过程拟真式地还原原始部落一对一的对话互动,兼顾私密性和陪伴性,给予听众临场化的真实感受。从表演特征上来看,评书人独特的演说风格和嗓子是不可复制的,类似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所提到的关键词“灵韵”^[13],例如单田芳的沙哑中带金属质感、刘兰芳的高亢如钟磬,其本身具备模糊性的特征,给人一种很难名状的心灵感受和体验。与此同时,听书过程建构了一种深邃的时空交织感,能带来独特的瞬时体验。例如单田芳的代表评书《隋唐演义》,通过生动演绎隋末唐初的风云变幻,将李元霸、单雄信、裴元庆等英雄人物的侠肝义胆、英勇无畏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听众在声音的秘境中见证了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在评书的叙事层面,评书并非单一的线性表述,而是穿插式的多线程讲述,会将故事叙述和人物评析结合起来。如评书的结构里含有舵子,即一篇评书中的各种矛盾点和高潮部分,会把故事自然地分成多个章节,通过平台的技术分割,将一篇评书分节,并在某个章节里将内容合理分配,形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效果,通过制造悬念激发听众期待,提高用户黏性。与此同时,“演”是一种重要的声音造型手段,通过拟声词、身段变化展现人物性格,听众在听书过程中需要发挥想象力,将自己代入故事情节,思索人物举措和发展走向,这在心理学上叫作“联觉”,也被称为通感。评书人富有特点的表现能力和语言风格,会拉近和听众的距离,营造亲昵可感的叙述氛围,通过听觉刺激人们的多感官活动,引发人们对故事人物的或扼腕或欣赏或惊叹的情感活动及心理变化,从而达到多感官的平衡。

(二) 空间融合:虚实叠加与评书实践的流动性

空间的概念由来已久,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理论,其核心观点是:空间的生产可分为三个维度,一方面,它们指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与表征性空间(symbolisms)的三位一体;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知的、构想的和直观的空间。^[14]其中,第一空间认识论侧重客观性与物质性,可以理解作为一种物质的和物质化的“物理”空间性,即现实空间。第二空间即构思空间,更多地强调媒介塑造我们对社会世界的认识和期望的意义,是一种由二进制数据组成的虚拟空间。第三空间则是现实与虚拟交织,进行意义重构的动态场域。

在以往的语言交流与沟通中,声音的倾听总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情境,现实空间及所在地点对于信息的获取、感知变化至关重要。为了防止内容的失真和传播力量的衰减,人们通过情境展开社会交往和认知获取,而封闭的空间抑或距离的限制,使得约定俗成的文化习惯、具有识别性的文化符号和文化传统等得以承继,其中,口语媒介既是内容的重要承载,同时也作为内容的一部分通过口耳相传和代际传播的方式将其逐步固定下来。

如今,电子媒介的特性,使得我们的社会空间出现不同程度的融合,信息可以突破地域、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流动,从而塑造一个新的社会样态,亦即媒介情境。“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场景,破除了旧的场景。”^[15]此时,原有的空间概念打破固定边界,在生成的过程中重新编码重组,生成另外的空间秩序——虚实共存,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成为一种彼此互在(inter-being)的关系,从而实现真实和想象、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在数字化媒介的评书实践中,人以身体作为媒介连接着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评书实践活动既是实体空间环境下的平台筛选和内容点击,实现人与内容的连接;也是虚拟空间中听众对评书人说演技巧的听觉捕捉,更是对评书故事的文化典故、英雄事迹、民间传奇的探索、思考与追忆。媒介空间化后,听众可以从任意地点出发,自由地游牧其中,找寻曾经的记忆,或对经典故事情景进行想象

拼接、代入分享。此时评书文化中包含的各种信息元素,就像茂盛的植物,生长在一片草原之上,等待人们去欣赏、去理解。这正如块茎“块茎是一种球茎植物,它的根状是串根的而不是树的纵向的那种,它是横向的、串根的,在土壤浅表层匍匐状蔓延生长,外形不一,它本质上是不规则的、非中心的、多元化的,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块茎思维。”^[16]块茎思维指向多元化、无规则、非中心和固定的形态,而数字时代虚实空间的叠加,充分体现了块茎“联系性、异质性、多元性、反意义”的不断生成特点,极大地丰富了用户听书实践的流动性、多样性。

(三)评书搭桥:游牧实践中的意义生成与文化重构

在新媒介生态下,评书这一传统听觉艺术经由数字化转译,成为新媒体用户进行“游牧式”文化实践的重要方式。作为流动的符号媒介,评书通过其特有的叙事结构和声音质感,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传播场域中构建起动态的意义网络。相较于传统媒介时期特定时间的内容追随,数字时代的听书变成用户主导下的内容检索——评书音频文本内容经过编辑整理、平台过滤和内容筛选,沉淀为评书大家的经典代表作和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平台将其置顶、有序排列,并通过算法机制对用户精准推送,以激活用户的听书需求。用户掌握听书主动权,自主安排听书时间和地点,建构听书仪式。这种仪式以固定、重复的行为,打造共通的意义和情感空间,而带有重温过去“瞬时体验”的过程,有助于个人将听书仪式中传递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认同完整嵌入到自我意识之中,个人也在当下的实践中重新将记忆进行重组,编织进属于自己的意义空间之中,这一空间以说书人讲述故事文本为载体,以自我与说书人的潜在对话为仪式。评书的故事文本往往取材于民间,经过长期的口传心授及不同后辈的加工整理,形成符合个人表演风格和评说演绎的范本。因此,每一个讲演的评书文本,都凝聚着评书人对故事独到的理解,同时也是对某时代社会现象、民俗风貌、伦理道德、人生哲理等的铺陈讲述,时代的画卷在讲评人的背景讲述中娓娓道来,道德观念和朴素的价值理念蕴含其中,展现出对真善美、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的各种人物的讴歌,对爱憎分明、惩恶扬善、家国情怀的大加赞扬,对卑微谄媚、大奸似忠、祸国殃民的各类人物的无情批判。于是,文化记忆在说与听的过程中得到了凝聚,并逐步完成听书群体建构和集体认同的确认。记忆中的人物类型等各种符号外化为音频内容,指向由评书故事组成的民俗文化、一方水土以及时代缩影背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谱系,从而超越个体经验局限和时空约束,实现与听书仪式勾连,生发出新的意义阐释过程,推动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完成再确认。

数字化传播语境下,新媒体用户的游牧式实践通过跨媒介参与和符号再语境化,将评书转化为流动的意义生产场域。用户不仅自主听书,还通过互动评论和创意改编等行为,将评书文化符号转化为可编程的文化资源,在多重空间交织中编织“意义之网”。其中,评书的传统符号系统,如方言、人物、情节等被剥离原生语境,通过游戏、网文、短视频等平台被重新编码,赋予新的当代意涵。例如,《水浒传》评书衍生出的手游角色,不仅保留原著精髓,还加入虚拟社群的二次创作元素;历史人物形象被重新诠释,既承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又融入数字化时代的审美取向与叙事方式。这种参与式实践不仅延续了评书固有的集体记忆功能,又赋予其新的文化阐释维度。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次记忆的再生产,用户跨越平台边界,在即时参与中不断解构与重组叙事内容,使传统文本在新语境中持续生成变异的意义节点。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意义生产并非均质的,而是呈现出“分层记忆”特征:算法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强化特定记忆路径——如青年用户偏好娱乐化解构,中老年用户倾向传统伦理叙事,而用户则通过选择性接触与创造性转化不断修正这张意义之网。最终,评书声音实践不仅承载文化记忆,更成为新媒体用户在多重空间中穿梭并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它既是传统集体记忆的存储器,又是个人意义建构的操作台,由此实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动态共生。

三、记忆重构:评书实践打造新型记忆场

20世纪8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通过“记忆之场”的研究追溯法国国民意识的形成。诺拉将“记忆之场”定义为承载集体记忆的物质或非物质载体,如纪念碑、仪式、档案、符号等,它们通过文化实践维系民族认同。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17]的交织体,只有当这三个维度同时作用时,一个对象或场所才能成为真正的“记忆之场”。与此同时,他强调记忆之场的流动性:随着时代变迁,其象征和功能可能被重构。^[17]在数字时代,评书实践通过媒介技术的介入,实现了记忆的流动化、代际化与经典化重构,从而形成新型记忆之场。这一过程既延续传统口头叙事的文化基因,又借助数字技术拓展记忆的生成逻辑,并借此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记忆媒介。

(一)记忆微光:数字媒介打造流动的记忆之场

评书文化的发展与媒介相伴,广播通过构建特定的收听时间与频道,形成不同代际的听书体验。广播评书刘兰芳《岳飞传》、单田芳《三侠五义》等给70后、80后留下难以磨灭的评书记忆。时至今日,评书在数字媒介平台收获新的拥趸,跨界主播青雪录制的《无家》《亮剑》《盗墓笔记》等,在继承传统评书结构的同时,融入时代气息,将评书艺术和现代故事内容完美结合,其听众遍及海内外,彰显评书在当下的特殊魅力。此外,数字媒介时代,评书从固定的口头表演转化为可流动、可交互的数字文本。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碎片化传播、喜马拉雅等播客平台的伴随性收听,以及AI语音合成技术对已故评书艺人的“数字复现”,如单田芳AI语音库,使得记忆不再依赖稳定的物理因素,而是以离散却持久的数据流形式存在。这种流动性增强了记忆的可及性,使其成为可追溯、可复现的文化档案。不论是收音机,还是移动化手机设备,借由记忆外化装置的存在,听书人得以时时重温个人的听书记忆时刻。有评书听觉记忆的人,一听到评书人熟悉的“开脸”技巧、定场诗、摆砌末^①等艺术手法,就会不自觉将自己代入到故事情节之中,这种独特的陪伴和共时感觉,代表一种独有的媒介怀旧体验。利用过往的听觉、社会意义和操作方式等开展一种技术性的怀旧,是个人与过往美好情感的联结,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轨迹,尽管这种心理体征是不可名状、较为私人的,但仍带有明显的社会特征。

换言之,个人的听书实践不仅出于获取知识、娱乐社交等日常功能,还在媒介和记忆的互构、缠绕中,实现一种记忆的闪回,依赖于媒介建构的时间流和声音流,去找寻自己记忆中的“微光”。这里的“微光”更多指向一种自我成长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评书体验,以及一种基于“保存式遗忘”的个人情怀,既出于对仪式化听书过程的情感感召,也是对“时间的消逝”的富有质感、细腻的情绪转化与寄托。听者凭借新型的数字媒介参与到由评书实践所建构的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流动场域中,通过感受评书文本所蕴含的情感唤起个人记忆深处的“微光”,而这种记忆微光则成为听者建构新型记忆场的中介物,将听众个体、承载集体记忆的评书文本以及参与评书实践所产生的情感联结起来,共同打造出独属于评书听众的新型流动记忆之场。

(二)记忆固着:评书声音实践打造听觉共同体

纵观媒介研究的历史进程,安德森探讨了关于媒介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在他看来,共同体可以通过集体想象而形成,这种想象共同体通过媒体、语言与文化等手段得以传播和巩固。^[18]换言之,在安德森的观念中,媒介能够给予人不同的想象方式,其中想象共同体可以通过媒介的作用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起来。而伴随媒介的演进,广播媒介日益边缘化,大部分学者把研究视角转向视觉领域,但广播作为延续口语与文字的重要现代媒介之一,其所能发挥的社会形塑潜力依旧不可忽视。广播

^①开脸儿是评书的开场白,相当于戏剧中的序幕,它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开启故事;定场诗是指在演出开始前,曲艺演员念诵的四句或八句诗,通常诙谐幽默、短小精悍,目的是快速吸引观众注意力,帮助演员迅速进入表演状态。定场诗不仅具有娱乐性,还常常蕴含劝世良言,旨在通过简短的诗句传达深刻的道理;摆砌末则是安排情节结构,通过巧妙的布局使故事进展有序。

的诞生与发展给听众带来全新的听觉经验。^[19]大众可以通过广播媒介创造不同时空下不同个体的共时性经历,这种经历主要凭借广播媒介对于相同文本内容的演绎建构起来,不同个体经由文本打造的想象空间展开沟通、交流、连接,继而形成共同体。这种由于听觉主体在相同听觉系统中相遇,并利用声音与听觉而形成的独特经历与体验,便成为 Truax 所称的“听觉共同体”^[20]。

数字时代的评书实践凭借数字听觉媒介探索出一条用于重新构建“共同体”的新进路。通过弹幕评论、二次创作或算法推荐,赋予传统叙事新的阐释维度。如年轻用户通过弹幕互动重构“关羽忠义”的当代意义,或将评书片段剪辑为短视频,使其成为“国风”亚文化的符号,通过对特定人物、故事、文本等进行多形态、反复、周期性的记忆构建,使同处一个听觉场域的听众通过“想象”形成特定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并进而构建具有集体记忆属性的文化仪式,由此形成评书的“听觉共同体”。与此同时,评书的声音特质,如方言、腔调、节奏等在不同文本的文化语境中,形成不同代际记忆的分野:老一辈听众通过广播评书,如20世纪80年代的《岳飞传》等形成集体化的“国家记忆”,而Z世代则借助ASMR(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自发式知觉经络反应)式评书,如B站“助眠向”评书剪辑或虚拟主播演绎,将传统叙事转化为个人化的“情感记忆”。这种差异揭示了声音媒介的“固着”功能——它既可能通过标准化语言,如普通话评书强化主流历史叙事,也可能因亚文化挪用,如“赛博评书”混音等解构权威,形成多元并置的听觉共同体。

(三) 经典传承:评书跨越世代的记忆铭刻

作为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经典的评书文化借由时代环境下不同的媒介平台,将听书人的个人记忆和代表民族精神的文化集萃、家国情怀,以信息流、音频流的方式融入到多向衔接、多元参与、多维解读共存的空间之中。此时声音不再仅仅传递一种符号化的观点和内容,更重要的是成为一种空间维度的环境本身,构成声音传递文化意涵、营造沉浸式陪伴的结构基础。评书讲述文本、媒介互构平台及阅听人,三者共动形成具有新媒体特性的“回忆空间”。回忆空间是阿莱达·阿斯曼所表述的综合性的文化分析内容,她强调,回忆根植于一个被唤醒的空间之中,回忆是需要通过特定的环境和空间才能重新得到回溯和复苏,也即阿莱达曾表述的回忆之力,即存储记忆的能力。经典文本内容传承发展的重要前序和基础,是通过熟记、复诵的方式,将一些应当铭记的传承经典,以历时回忆的形式保留其基本内容。但在储存的维度上,记忆遗存于时间轴上的序列之中,称之为记忆的记忆,是无人栖息、暂时进入沉睡的记忆内容,而激活只能通过不断将后人纳入到“回忆空间”中,实现文本内容的整理、流转和再发展。^[21]评书文本具有上述特性,其将讲述内容通过语言和表演风格的成型,拟成可以登台表演的作品,并融合后人的不断补充和时代风格,实现了存储记忆向功能记忆的延伸。

数字时代,评书作为“活态遗产”,通过代际传递实现了文化记忆的激活与社会整合功能。一方面,传统评书剧目被数字化存档,成为可检索的“文化数据库”;另一方面,年轻创作者通过“评书+”,如结合脱口秀或电子游戏叙事的再创作,使经典历史人物被赋予当代价值观,如三国人物的“职场智慧”“逆袭叙事”等。这种传承使得数字评书不仅是文化消费对象,更成为社会记忆动态再生产的媒介节点,在代际更迭中保持生命力。

四、结语

评书的声音实践是多方元素共动的结果。一方面,评书艺术的发展需要不断从更新的“媒介域”中得到滋养,媒介域是指一种特定的时空组合,这种组合是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结构,包含传播规则、符号和社会组织安排等,每一次媒介域构型的调整,是社会占主导的传播方式的变化,是一次传播秩序和规则的变化。评书的发展与媒介进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评书的声音实践历经广播时代的繁荣、电视时代的发展与沉寂,而后在数字媒介时代重新焕发生机,其背后是阅听人、媒介互构平台、声音、文本等形成的人与非人行动者网络共同发挥能动性的结果,这种由于时代变迁和媒介技术

发展而进行转变和调整的行动者痕迹,将一个网络中的每个行动者都置于主体位置,多方共动,共同促成了评书声音实践的传播扩散,并进而建构不同的媒介记忆方式。

基于媒介学的研究视角不仅让听觉文化重回研究的“聚光灯”下,同时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到数字媒介时代下评书文化的记忆形塑潜能。数字媒介时代,听众自主筛选确定满足自身需求的听觉文本内容,并在听书实践中凭借共时性经历与多重时空下的别样个体相连,激发不同个体共有的精神归属,进而形成独属于评书实践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具体而言,在听书的过程中,听众以身体作为媒介连接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多感官的调动打造更为丰富立体的听觉空间,而游牧于评书文化打造的虚实融合空间中的多元运动主体,借助评书实践生成基于听觉文化记忆的意义之网。当人们的记忆在不断地进入新记忆空间的过程中,集体的记忆内容得到复写、修改和调整,并最终带来文化记忆的确立、更新与存续。同时,在评书实践所建构的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流动场域中,评书文本唤起听众个体记忆深处的“微光”,实现打造听众的流动性记忆场。而参与评书实践的多重主体均在流动的空间中互相作用、相互影响,凭借媒介与声音符号对评书中的特定人物、故事、文本等进行反复、连续、周期性的记忆重塑而建构起用户的“听觉共同体”。至此,数字媒介评书通过技术实在性、文化象征性、社会功能性的交织,构建一种流动的记忆之场,它既延续了传统叙事的记忆内核,又通过数字交互重构记忆的生成逻辑,反映了技术时代记忆实践从“固态存档”向“液态参与”的范式转型。

参考文献:

- [1] 宋青.从广播长书到有声阅读——改革开放40年中国广播文艺发展媒介学解读.出版发行研究,2018,8:15-20.
- [2] 蒋文娟.田连元:生来就是说书的.兰台内外,2012,4:62.
- [3] 张啸涛.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评书艺术的发展.曲艺,2021,10:42-43.
- [4] 艾媒咨询.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已达7.47亿人,预计中国声音经济市场规模2029年将突破7400亿元.2024-12-05.[2025-03-03]<https://mp.weixin.qq.com/s/lh1Ex7IIP-L8xZkeFt-GA?scene=1>.
- [5] 喜马拉雅.2024春季有声阅读数据报告.2024-04-24.[2025-05-0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7028718722801263&wfr=spider&for=pc>.
- [6] 徐生权.媒介会甘于做一个信使么?——论媒介的“纠缠”与“衍射”.国际新闻界,2021,11:66-68.
- [7]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4;7.
- [8]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8.
- [9]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5.
- [10] 陶锋.反视觉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视阈中的培根艺术.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6:6.
- [11]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09.
- [12]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3.
- [13]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在文化工业时代哀悼“灵光”消逝.李伟,郭东编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6:113.
- [14]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王士盛,王玉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5(中译本代序言).
- [15]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7.
- [16] 曾建辉.简论吉尔·德勒兹的传播学思想.理论月刊,2012,6:181.
- [17] 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曹丹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20.
- [1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59.
- [19] 米歇尔·希爾穆斯.广播与想象的共同体.王敦,程禹嘉编译//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3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51-59.
- [20] B. Truax. Acoustic Communication. Westport: Ablex Publishing, 2001: 66.
- [21]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9.

The Sound Practice of Storytell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a Memory

Zhao Huan, Hou Qingpe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 Bo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Chinese storytelling is a signific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ne folk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nicely reflects the distinct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influence by the media. The storytelling communication has experienced sound practic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while the rise of radio contributed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torytelling at the turn of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rapid iteration of television and digital media has brought about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storytelling and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opened up a new media practice of storytelling for audiences in cyberspace. As the nomadic movement subject of digital existence, the listeners adhere to their mobility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autonomous scree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various auditory text contents, shuttle under the multiple superimposed influences of real space, virtual space and memory space, construct their own information flow and content flow, form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y and weave a network of meaning. With the deduction of the same text content, storytelling communication creates the synchronic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which urges them to meet in the same auditory system, develop imagin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ion, and uses sound and hearing to form unique experience, thus forming an auditory community. In the field of flowing memory, people either look for the glimmer in the memory of storytelling, or imagine and share the classical story scenes, so as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and mixing of the three spaces of entity-imagination-memory. In the form of symbolic performance, the cultural memory thus constructs a solid memory space so that the eternal core of culture can be preserved and continued.

Key words: storytelling; materiality; auditory community; cultural memory

■ 收稿日期: 2024-11-18

■ 作者单位: 赵 寰, 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5

侯清鹏, 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

蒋 波,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303

■ 责任编辑: 刘金波